

J

intianping

金天平

第2卷



宇 钟等/著

人的一生往往在平淡中异峰突起

吴建璠就是一位大器晚成的著名法学家

1996年1月26日

他从原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

乔石手中接过香港特区

筹委会委员的任命书

1998年5月5日

又从现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

李鹏手中接过澳门特区

筹委会委员的任命书

他还身为八届政协委员



法学家吴建璠 的成功之谜

薄一波给我的救命信

囚徒作家和他的《赤裸人生》

“9·13”后的陈励耘

粉面巨贪

法律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天平 第2卷/宇钟等著. —北京:法律出版社,
1999

ISBN 7-5036-2676-3

I. 金… II. 宇… III. 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—
选集

N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36455 号

出版·发行/法律出版社

经销/新华书店

印刷/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二〇二工厂

开本/850×1160 毫米 1/32 印张/6.5 字数/180 千

版本/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/00,001—20,100

社址/北京市广外六里桥北里甲 1 号八一厂干休所 (100073)

电话/63266794 63266796

出版声明/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书号: ISBN7-5036-2676-3/I·136

定价: 15.00 元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 本社负责退换)

目 录

人物专访

- 薄一波给我的救命信 宇 钟 (1)
- “9.13”后的陈励耘 蔡 新 (11)
- 法学家吴建璠的成功之谜 肖 云 (22)
- 铸成“金钥匙”的人
- 访徐铸成之子徐白仑 汪 萍 (29)
- 科学家的金色婚床
- 访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 张 玲 (39)

社会写真

- 囚徒作家和他的《赤裸人生》 远 征 (46)
- 萨克斯王的人生悲歌 上官玉洁 (53)
- 花季的沉思
- 坐台女中学生调查录 谢朝平 (65)

话题评说

- 你敢伸出你的双手吗
- 国家安全部原副部长胡绍普的晚年生活 阿 珍 (75)
- 领导干部退位之后探访 肖 佳 (81)
- 豪华商厦会在下岗热流中“倒塌”吗 阿 成 (86)

万象世界

- “同性恋”走出阴暗角落 辛汝忠 (91)

婚姻长廊

- 中国第一红娘“红”遍京城 鲁 汉 (123)
- 出狱后我还要你 国 鹰 (134)

大案纪实

- 粉面巨贪 刘坤赤等 (140)
- 中英警方联手再破跨国绑架案 孙德平 (148)
- 险遭枪击的新闻记者 晓 萍 (156)

法苑文艺

- 鬼楼 王 心 (165)
- 监狱里的月亮 李文华 (172)
- 主奴恩仇录 臧 马 (190)

薄一波给我的救命信

■ 宇 钟

最近，听说公安部出了个女诗人，并要出版一本诗集，说是要我写篇文章附在诗集里，我便去采访了她。

原来她是位 81 岁的老革命，公安部原常务副部长徐子荣的夫人孟松涛。夫妻二人，在为新中国奋斗的战斗岁月里，一个是儒将，一个是女杰，建国后，夫妻俩又为人民公安队伍建设呕心沥血。在十年浩劫中，夫妻俩在战火中熔铸的爱情更加纯洁而坚贞！

一般说青年人喜欢写诗。青年人善于幻想，对事物敏感，而且有激情。可她已到古稀之年，怎么又写起诗来了呢？她说，在她的一生中，有很多永生难忘的人生故事，一回想起来，心情就很激动，就忍不住想用诗表达出来，朗诵出来，尽管她双目失明，一根橡皮管插入气管，说话时必须按动喉头的金属钮方能发音，说话很吃力，但讲起自己的人生故事，神情仍异常兴奋。

薄一波同志为我们当红娘

1936 年 10 月，孟松涛离家来到太原，进了军政训练班，自此走上革命道路。领导对她很重视，认为这小丫头胆子大，脑筋活，能说会道，是班上的重点培养对象。

1937 年 4 月 12 日，薄一波见了她，上下打量了她一番问：“你这个小鬼是从哪里来的？”

孟松涛听说他是这里的最高领导人，慌忙地说：“从河南确山来的。”

薄一波同志进而问：“你出来干什么？”

孟松涛干脆地说：“我来参加革命。”

“革命干什么？”

“推翻旧世界。”

薄一波同志见她回答得很干脆，也在理，便笑笑说：“你这个小鬼头脑很清楚呀！”随后他又问了孟松涛一些河南的情况，最后说：“很好！过几天我给你介绍一个人。”这个人是谁呢？他没有当即说出来，孟松涛也没有往心里去。

过了十几天，在一个春风飘香的傍晚，孟松涛正在教室里上晚自习，听有人敲门，并喊她的名字。她连跳带蹦跑出了教室，只见一个陌生男子站在面前，她借着门口的灯光细一打量，他头戴深灰色毡礼帽，鼻梁上架一副金丝茶色眼镜，身穿暗绿色夹袍，外罩阴丹士林布大褂，脚上那双咖啡色皮鞋，在灯光下闪着亮光。她心想，这是从哪儿来的学者？找我干啥？……

他摘下眼镜说：“你认识孟宪昆吗？”

“孟宪昆是我四叔的儿子，是我二哥呀！”

“你知道他爱人是谁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他结婚时我在学校没有回去。”

他听了笑笑说：“那是我妹妹。我叫徐子荣。”

孟松涛一听，又惊又喜，忙说：“你就是徐子荣呀！我早就听说你的大名，但一直也没见过面，原来咱们还是亲戚呢！你是老革命了，可要好好帮助我呀！”

尔后，他说：“我从豫南刚回到太原，下了火车就直奔薄主任办公室，薄主任说，确山来了个你的小老乡叫孟松涛，这孩子特机灵，头脑清楚，快去看看她吧！听后我想，孟家的男孩子都没有参加革命的，竟然来了个女孩子，我怎么没听说。刚想坐下喘口气，薄主任就催我，别洗脸、喝水了，快去看看吧！”

徐子荣出生在河南确山县古城乡傅楼村一个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，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曾担任过确山县委宣传部长、县委书记。1928年7月，确山第二次武装暴动失败后，徐子荣先到开封，后到北

平，进郁文大学、民国大学求学。他经民国大学地下党负责人介绍，加入了北方左联，1932年参加游行示威时，被国民党抓捕，并被判6年有期徒刑，送进北平草岚子监狱，和薄一波、安子文等同志关在一起，1936年经党组织营救而出狱。

徐子荣在军政训练班六队担任教导员。自此一段时间，每晚上下了自习课，他都邀松涛在院内散步，畅谈革命理想和家乡的情况。有一天晚上散步时，徐子荣对松涛说：“我和你接触这么长时间了，对你的印象很好，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，不知你能不能接受？”

松涛深情地望了他一眼，说：“你提吧。”

徐子荣说：“我希望你能成为我的终身伴侣。”

松涛一听，脸一下子红了，双手捂着脸就往前跑，他就紧跟在后面追。当他追上松涛说：“可能说得太突然了吧？”

松涛心想，你这个楞头青，这种事你怎么说，不会写封信表露一下，这么直接了当，让人多不好意思。此后的一段时间里，她感到很不好意思见他，老躲着他。后来，她想，这样也不好，子荣是个老革命，我很敬佩他，对他也很有好感，既然出来闹革命，还这么封建，多不好。于是，她又主动和子荣恢复了每天的课后散步。

由薄一波同志介绍，徐子荣与孟松涛经过一段时间的互相了解，1938年12月他们便喜结良缘。当时徐子荣在中共晋冀豫区党委任宣传部长，住在山西屯留县。结婚时，松涛是单身骑马从沁县赶到屯留的，婚礼简简单单，只买了几毛钱的花生，招待了一下宣传部的同志们，但婚礼又很热闹。大家让松涛介绍恋爱经过时，她说：“我和子荣是河南老乡，我们还是亲戚，他是革命老同志，他们家庭是革命的家庭，他的父亲为掩护革命同志，宁死不屈，被敌人活活折磨死；他的母亲，被敌人抓去站不拢，在大街上示众，待家人把她赎出来时，已经无救了！我能遇到子荣这样的好同志，是我的荣幸。如果不出来参加革命，我怎能遇到这么好的革命伴侣！”

薄一波同志给我的“救命信”

1937年5月1日，孟松涛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薄一波同志

很器重她，经常带她去参加一些革命活动，使她进步很快。11月，孟松涛被派到山西高平县任县委书记兼牺盟会特派员。在高平，为了发动群众，先办了个训练班，她亲自给大家讲课，讲革命理论，讲革命形势，并从几百人中挑选了40名条件好的担任了牺盟会协理员，到各村各乡建立支会、分会，宣传群众，发动群众，组织群众，搞得轰轰烈烈，很快打开了局面。当时的高平县长叫刘涵森，是阎锡山的亲信，他不断向阎锡山密报高平牺盟会的活动情况，称孟松涛在高平搞赤化，要求阎锡山下令除掉孟松涛。

1938年2月，阎锡山从利用决死队、牺盟会转向取消决死队、牺盟会。一次，他将一封刘涵森的密电甩给薄一波，上面有他的批示：“孟松涛系赤色共匪，在高平搞赤化活动，应就地正法。”

薄一波一看，问题很严重，很冷静地说：“你交给我处理吧。”

随后薄一波同志派通讯员骑上快马，给孟松涛送来了一封亲笔密信，信是这样写的——

小鬼：

你要小心你的脑袋，你不要盲人骑瞎马，跟着别人瞎跑，
千万千万，你要小心脑袋。

薄一波

1937.11.16

孟松涛接到信一看，心领神会，知道事不好了，但她没有吭声，默默地笑了。她很镇静，把信揣进了怀里：这是薄一波同志给我的救命信。

几天后，县里召开牺盟会协理员会议，孟松涛正在讲话，忽然听到门外有人喊她。孟松涛出门一看，是一波同志。她高兴地说：“薄主任，您怎么来了？”

“我的信你看到了吗？”

“看到了。”

“看到了还问干吗来了！你赶快跟我走！”

松涛为难地说：“我正开会，待我交待交待工作。”

薄一波同志有点急了，他说：“走走走，马上走，赶快走！”

就这样，没容松涛开完会，一波同志就把她带走了。

松涛上了一波同志的汽车，一下子就把她拉到了沁县。一波同志当即就任命她为沁县牺盟会特派员。

谈起这件惊心动魄的往事，至今孟松涛仍激动不已：“是一波同志救了我一条小命！”

重返太行寻儿子

徐子荣离开太行山时，孟松涛因为怀孕，就留在了地委做一些具体工作。1945年2月7日，便生了一个儿子，取清漳河之名为孩子起名叫清漳。40天后，徐子荣派人来接她，因她没有奶水，只好将孩子托付给当地奶娘，留下儿子含泪告别太行到了豫西。在那里她担任了偃师县委副书记兼一个区的区委书记，领导群众开展了“反霸倒地”运动。
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为了争取国内和平，国共两党举行了重庆谈判。党中央以民族利益为重，作出了必要的让步。一支队奉命撤离豫西，南下桐柏、大别山区，与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五师汇合。一支队和地方武装迅速集中，进行了整编。一支队改编为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旅，皮定均、徐子荣分别任旅长和政委。

1946年9月中旬，孟松涛向子荣提出，我生了儿子40天就离开了他，至今已一年多了，也不知孩子现在怎么样了？我想回太行找孩子。

子荣说：“此去太行路途遥远，我很不放心。”

松涛说：“你只管放心，我有一定的斗争经验，会应付复杂的问题的。”

经组织批准，同意松涛回太行找孩子。临行前副旅长给了她一头骡子，派了一名老同志和一名警卫员，还给了她一笔经费作路费和生活费。

他们一行三人，化装成老百姓，从江苏高邮出发，途经山东、河北回太行。一路上早行夜宿，也还算平安。当他们进入山东肥城时，发现形势有些紧张，村落沉静，行人稀少。在进县城的路上，碰到一个教师打扮的人，松涛上前向他打听县城里的情况。他有些恐惧地说，县里的单位都撤了，还乡团要来了！松涛又问他，县城里还有什么单位没有走？

他说，可能电信局通信班还在坚持，他们负责收发电报。最后他把电信局的具体地址告诉了松涛，就急匆匆地离去了。

天色渐渐黑下来了，县城里死一般寂静，他们很顺利地找到了电信局，可是大门紧闭，松涛敲了老半天，才听见里面有人出声：谁？干什么的？”松涛隔门说明了情况，请求让他们进去躲一夜。松涛说了半天好话，大门总算打开了，他们赶紧进去了。这时走出一个负责人说，这几天形势严峻，还乡团要回来了，我们因为有任务在身，还得坚持，同志们都在房上，你们既然也是队伍上的人，你们也上房吧，如果今晚能平安，明天赶快离开这里。

他们上房后，看到房上有六七个人，都端着枪趴在那儿。这里的负责人也给了松涛一杆枪。半夜时分，枪声四起，人喊马叫，跑来跑去，乱哄哄。他们趴在房顶上，大气不敢出，一直到拂晓，枪声才慢慢平静下来。天亮后，打开门一看，大街上横竖着许多尸体，果然是还乡团来洗劫县城了。幸亏电信局比较偏僻，不然，他们的后果不堪设想。那个负责人对他们说，趁还乡团走了的空当，你们赶快上路吧，我们的任务完成了，也要撤离了。他们很快离开了县城，在出城路上，又见左一具尸体，右一个死人。

他们走了一支烟的功夫，见路边有个烧饼铺，老板娘正在那儿做烧饼。老板娘抬头见走来三个人，还有个女的，惊得直叫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，这么大胆，还敢在路上走，没见过死了这么多人？”

松涛接茬问：“这是怎么回事儿？死的都是什么人？”

老板娘说：“别管那么多了，快带些火烧走吧！”

松涛问：“这附近有我们的部队吗？”

老板娘说：“前面是东阿县，那里可能住着八路军……”

他们离开烧饼铺直奔东阿县，还真的找到了部队。他们在部队里休息了十几天后，随着部队去了太行。

太行区党委机关已经换了地方，怎么办？松涛正左右为难的时候，听说薄一波同志正在太行，决定去找他。费了几番周折，好不容易找到一波同志。松涛说：“薄主任，你还认得我吗？”

一波笑笑说：“这不是小孟吗？你这个小鬼，我怎会不认识。”

松涛把来太行的原因告诉了他。一波同志说：“真难为你们了，先好好休息一下，孩子会找到的。”

休息了几天后，松涛拿着临行前子荣写给李雪峰同志的信，找到北方局，他们被安排到太行区党委南庄疗养所居住。他们马上去找孩子，总算找到了。孩子快两岁了，松涛从40天和孩子分离，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，她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儿子，她一把把小清漳抱在怀里，看着黑脸赤脚，破衣烂衫的儿子，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，泪水大颗大颗地滴在孩子的头上。他们感谢了奶娘和乡亲们后，把孩子带回了南庄。

“文革”中革命夫妇惨遭迫害

六十一军正在宝鸡一带休整，准备入川作战，参加解放大西南战役。正在此时，也就是1949年10月18日，徐子荣在宝鸡接到中央的通知，调他到中央公安部工作。

公安部成立后，于1949年8月9日致电各野战军前委，电称：军委决定由一、二、三、四野战军各抽调军级政治干部一人，来公安部担任局长。与此同时，薄一波同志向中央推荐六十一军政委徐子荣。薄一波同志说，徐子荣既懂军事，又懂政治，既能做组织工作，又能做群众工作，还能写一手好文章。中央接受了这一建议。

徐子荣来到公安部后，罗瑞卿部长委他以办公厅主任兼人事局局长的重任。两年后，在罗瑞卿部长的举荐下，1952年2月7日，中央任命徐子荣为公安部副部长。同年9月，又被任命为公安部党组副书记，此后，徐子荣担任了公安部常务副部长。

松涛随着子荣也留在公安部工作，先在人事局，后在政治部干部处担任处长。

松涛想，自己受党这么多年的教育和培养，应当为党多做一些贡献。可子荣总以不出头露面的革命前辈邓大姐、蔡大姐为榜样，让她在公安部甘当普通一兵。有一次她碰到薄一波同志，一波同志半开玩笑地说：“小孟，怎么你同徐子荣结婚后就没有什么作为了？”她感到很委屈，

就向子荣倾诉说：“我这几十年来好比一只大石龟，在你这块大石碑下压住了，永世不得翻身。”每次调职提级，子荣总是先向政治部打招呼，说公安部的老同志多，要照顾其他的女同志，就不用考虑孟松涛了。

提起“文革”，孟松涛老人向笔者含泪讲述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

“文革”运动开始不久，子荣便无端地被打成了“反革命”。1967年1月5日晚上，造反派抄了我们的家，把子荣绑架走了。子荣一走，整整两年半的时间音信全无。我们没有一天不在思念亲人，子荣在哪里？他生活得怎么样？我们一无所知。

但子荣被批斗后对我说过的话我永远忘不了，他说：“我这辈子所做的是党知道的，这个我不怕，怕的是奸权当道，杀人灭口，再栽赃是畏罪自杀。但你要相信，整我的决不是好人，历史会作出公正的结论。”

1969年6月18日，三个穿军装的人突然通知我说：“徐子荣病了，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同意家属探望。”接着又厉声厉色地说，“探望有三条规定：第一，徐子荣罪行严重，你们必须和他划清界限；第二，看到徐子荣不许动感情；第三，你们看到的一切包括在哪个医院都要严格保密，不准向任何人泄漏，否则不准探望。”听了这番话，我的心立刻紧缩起来。两年半了，我无时不在想念子荣，盼望着和他的团聚。但这突如其来的通知，不由使我想起子荣被抓前对我说的话：“他们是绝不会让我生还的。”我悲痛地感到不祥之兆临头了。第二天上午，在儿子的搀扶下，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，走进医院的“隔离室”。十几个人早已等候在那里了。先是一位女“大夫”，手里拿着两页纸向我们介绍“病情”和治疗情况。接着，一群人带着我们走进一道挂着大铁锁的门，又进了一道带监视孔的门，才到子荣的房间。这是什么“病房”呀！窗子上钉着密密的铁栏杆，遮住了全部光线，又阴又暗。小屋空空荡荡，没有桌椅，也没有床，就是一个穿着囚衣，胡子老长，两眼深陷，骨瘦如柴的人躺在水泥地上的一块木板上。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这是子荣吗？这是我的丈夫吗？这是共和国的公安部副部长吗？我真的不

敢认，也无法认。见此惨景，我毛骨悚然，悲愤塞心。我不顾一切跪下去喊：“子荣，我是松涛，毛主席对你很关怀，知道你病了，让我和孩子看你来了。”只见子荣干裂的嘴唇动了一下，没有声音，也没睁眼。我又说：“你要好好治病，把心放宽，相信党相信群众，问题会弄清楚的，把病治好将来还要为党工作，毛主席会给你出路的。”我讲到这些，子荣深沉地叹了一口气，从他那深陷的眼睛里禁不住流出了滚滚热泪。子荣是个非常坚强的人，还从未见他这样流过泪，可是……我忍着肝肠痛断的悲戚，仔细端详着子荣，抚摸着他的额头，感到子荣神态清醒，反应灵敏，体温不高，腹部没有腹水，但就是不能说话，不能睁眼。看到子荣干裂带有血丝的嘴唇，我请求给他喝点水，但没有被允许。我和孩子整整30个月没有见到子荣了，在他身边呆了不到10分钟，就被看守把我们硬是分开了。我想着子荣为党为人民一生鞠躬尽瘁，想着我与子荣一生患难与共，想着他蒙受的清白之冤……我多么想在子荣弥留之际在他身边多呆一分钟啊！我多么想分担他的痛苦和忧虑，凭借我的全部力量来安慰和照顾他啊！我悲痛万分，欲哭不能，欲怒不敢，强忍着剜心割肉的巨大苦痛，被迫离开了自己的亲人，就这样我和子荣作了最后的诀别。

6月20日下午，办案人员通知我：“徐子荣今天中午12点20分死了。”这句话像电触雷击，刹那间我感到天旋地转。

我和孩子来到停尸房向子荣的遗体告别。只见子荣戴着一顶破帽子，帽檐耷拉下来，盖住了眉毛和眼睛，穿着又烂又脏又臭的一身黑色囚服，悲愤孤寂地躺着。这就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、全国人大常委会、中共公安部党组副书记、常务副部长徐子荣吗？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一生的忠诚战士，就这样被草菅了生命，年仅62岁。子荣啊，子荣！你这个在国民党酷刑面前压不垮，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打不倒的铮铮硬汉，如今却倒在了林彪、“四人帮”一伙屠杀老干部的血泊中……

徐子荣的遗体被当作“无名尸体”火化了，并宣布：叛徒、特务分子的骨灰，一不准进八宝山；二不准进公墓；三不准放在公安部院内；四不准留在家里。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，竟容不下一盒党和国家

的忠臣良将的骨灰，天理何在！在抗日烽火中出生的儿子清漳说：“我陪伴爸爸的骨灰到老！”在他被赶出北京的时候，偷偷将父亲的骨灰打在背包里，从北京背到四川，又从四川背到天津，他流落到哪里，哪里就是他父亲安寝之处。清漳辗转几千里，才侥幸把父亲的骨灰保存下来。

子荣被害谢世后，我极度悲愤，终日不语，日夜难寐，在一种难于自控的情况下，用刀扎坏了自己的喉管，昏倒在血泊中。在医院急救时，“造反派”声称：对叛徒的老婆“只能保命，不能治疗”从而使我留下了插管呼吸的终身残疾。事过不久，我被“造反派”视为“叛徒的老婆”，被放逐到黑龙江笔架山劳改农场强迫劳动。

1975年，邓小平同志出来主持中央工作，我感到党有救了，国家有希望了，徐子荣等老一辈同志的平反有希望了。我就有关问题向邓小平同志写了申诉信。1976年4月5日“天安门事件”后，邓小平同志蒙受“四人帮”的诬陷，又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，我很不理解。因此，我又被“造反派”新帐老帐一起算，打成了“翻案老手”、“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”，被软禁审查，而后专案组对我作了宣判：“孟松涛是现行反革命，判处死刑，解回原籍执行。”

正在这时，“四人帮”被粉碎了。同年11月6日，我又不明不白地被释放了。

1979年1月25日，中共中央在全国政协礼堂为廖鲁言、徐子荣、胡锡奎、刘锡五、王真梅等5位同志，召开了平反昭雪追悼会。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主持了追悼会，中共中央秘书长胡耀邦致悼词。纠正了过去对徐子荣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，肯定了徐子荣同志一生为党为人民所作的无私奉献，在全党全国范围内为徐子荣同志恢复了名誉。徐子荣同志多年沉冤得到了昭雪，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。

子荣虽然含冤谢世了，但公安部的同志没有忘记他，全国公安战线的同志没有忘记他，为了缅怀徐子荣，最近由薄一波同志亲笔题写书名的《徐子荣传》出版了！让历史记住教训，愿教训感动历史……

“9.13”后的陈励耘

■ 蔡 新

陈励耘，这个当年曾家喻户晓，风靡全国的名字，这个被称作“林彪反革命集团死党”，“‘三国四方会议’骨干”，“企图调伊尔-10飞机轰炸毛主席的凶手”，随着林彪“9.13”一声爆炸，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。

他现在在哪儿？

他的生活状况如何？

他现在在离上海不远的一个小县城里，生活由民政局照管，每月250元生活费，行动自由，和老伴住在一起。

居委会派了一个姓姚的大妈给我带路。姚大妈是个热心肠，一路上跟我说，陈励耘待人很和气，和邻居也相处得不错，卖肉的人都不欺负他。

“他到底是什么性质？”我问。

“没什么性质。”姚大妈说，“反正没说开除党籍，可又不叫他过组织生活。大家都叫他陈同志，也有叫‘陈司令’、‘陈政委’、‘陈军长’的。逢年过节，县长、县委书记、民政局长也去看望他，给他送东西。”

姚大妈把我带到一幢灰色的普通公寓，墙上标着××新村13幢。

爬上二楼，姚大妈熟悉地敲了敲门，并直着嗓子叫：“老陈同志，有个记者找你。”

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，一位头发斑白的老者站在我面前。他穿着一件灰色的羽毛绒衣，身材魁伟挺拔。70多岁的高龄虽然使他显得有些虚弱，但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仍在他身上遗留着军人气质。他脸色略显苍

白，但五官清秀。与其说是一介武夫，倒不如说更像一位文质彬彬的学者。他的目光炯炯有神，但看我时带着明显的戒备和疑虑。可以想见命运的坎坷留在他心底的创伤。

他把我们让进屋。房子极普通，两室一厅，还有一个小小的厨房。厨房的一面墙上，挂着一串铁锅、篮子。煤气灶旁，一溜排着锅铲、铁勺；水泥壁柜里，挨个儿放着各种佐料瓶，瓶上贴着写有白糖、黄酒、醋等字样的小纸片，整整齐齐，颇有部队操练的味道。

“年纪大了，怕搞错，贴上这些。”他见我在打量壁柜里的瓶子，不好意思地笑笑。

我们在厅堂里坐下。厅堂不大，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，只有几把普普通通的椅子凳子，和一个完全是当地老百姓用的红漆柜子。陈励耘给我们泡来两杯茶，并掏出一元多钱一包的“红西湖”烟敬我。我连忙推回，说不会，他才自己点上。

姚大妈把我介绍给他，并对我说：“这就是陈励耘同志。”我刚要说话，不料卧室里传来一阵女人的呻吟声。陈励耘忙站起身，抱歉地朝我笑笑，说：“对不起，我老伴病了，我去去就来。”说着，忙推门进去，不一会，又跑出来，倒了一杯开水，又跑进去。

望着他的背影，我心里不由涌起一阵怜悯。刚才在路上，姚大妈告诉我，陈励耘老伴曾经也是一位高干，陈励耘出事后，她也受了牵连，被抓了起来，整整关了7年，1981年才回到家里，现在已经离休……。我真想跑进去去见见这位饱经沧桑，现在和丈夫相依为命的女人。但碍于礼貌，我不能这样做。

陈励耘终于出来了。姚大妈说：“你们谈吧，我不打搅了。老陈同志，你就好好跟他谈吧！”

陈励耘点点头，把她送到门外，回身坐下，问我：“谈什么？”

“能谈谈你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吗？”我委婉地问。

“不。”他脸上肌肉一阵抽搐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不谈这个。”

“你有顾虑？”

“什么顾虑？我再也不愿意去触及那段历史。我精神受不了。”他神

色黯然。

为了尊重他的意愿，我说：“那好，我们能谈点别的吗？”

“谈什么？你说。”

“譬如你在‘9·13’以后的情况，以及现在的生活。”

“行。”他竟爽快地答应了。

下面就是陈励耘的谈话。

一、被捕在锦江饭店

1971年8月下旬，也就是庐山会议批判陈伯达一年之后，毛主席到南方巡视，先到武汉，再到长沙、南昌、杭州。在武汉、长沙期间，他分别把部分省市的领导找去谈话，谈话内容对外绝对保密，当时我们也不知道。

9月3日，毛主席的专列到达杭州。汪东兴、张耀祠把我和南平、熊应堂叫到毛主席专列上。毛主席批评了我。

毛主席住在西湖边的汪庄，对外叫第一招待所。我负责安全保卫。直到9月10日下午，毛主席才离开杭州。

送走毛主席后，我心情非常沉重，加上劳累过度，我病倒了，住进了空军杭州医院。9月19日，我觉得稍好一些，便到警卫处处理一些事务，晚上回到家里，跟老伴和9岁的小女儿住了一晚。小女儿已经好几天没有见到我了。她抱住我的头问：“爸爸，你最近为什么天天不回来呀？”

我说：“爸爸最近很忙。”

小女儿说：“你什么时候不忙，一定带我去灵隐寺玩玩，那儿的菩萨好大好大。”

我说：“灵隐寺还没有开放。”

她说：“都说你是大官，你去就能看到。”

我拍拍她圆鼓鼓的脸，说：“好，爸爸以后一定带你去。”

第二天，我又到警卫处。刚跨进门，南平的电话来了，说接上海王洪文电话，中央有一个重要文件到上海，不发到省里，叫我和他一起去看。我忙问：“什么时候走？”他说：“下午3点。”我又问：“要带什么